

玉渊杂谭

最近偶然看到两则报道:某百年毛笔老字号的制笔工艺无人继承,只剩下两位老人静静坚守;某著名墨水厂高薪也招不上工,其制墨工艺面临失传。说起来,这些年传统技艺濒危已是过熟话题,对这类报道也早就免疫。但此一笔一墨,一北一南,一呼一应之间,还是令我不由得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收起情怀,回归理性,这就是工业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传统技艺面临的尴尬也不单是市场的问题。就拿毛笔

和墨水行业来说,还算不太小众,手工艺人的收入是可以有保障的。但制笔需要精心专注,甘于寂寞,制墨也得不怕脏不怕臭,年轻人做不来,不愿做,自然在情理之中。况且,制笔所用的“狼毫”总归是伤害了有益的黄鼠狼,还有制墨对环境的影响等等,都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环境价值理念。所以,放诸市场,当一些传统技艺作为饭碗而存在,市场规律不可违背,保不住倒也罢。

在非遗传承问题上,饭碗和技艺却

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坊间往往混而谈之。认识上有偏差,总想着用技艺捞饭碗,那么所谓的传承和利用自然不得要领。比如几百年来民间婚嫁娶礼乐的主角唢呐,作为技艺本身,唢呐理应收入《百鸟朝凤》的绝唱。可是作为饭碗,非遗传承人不得不吹“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这还不算太差,假如哪个自以为有文化的旅游开发商脑袋一热,要把当地“原汁原味”的民间唢呐作为非遗表演搬上舞台,对着广大游客吹奏起

哀乐,那才叫一个啼笑皆非!而事实上,正是有太多借非遗的壳儿捞油水的如意算盘,“非遗圈”才会如此乱象。

我一直挺反感“利用”这个词,好像什么东西有价值就非要利用了才。对野生动物也谈利用,不是被喷了嘛!对非遗,其实同样道理,有些极具民族性、地方性、艺术性的技艺,在传统社会也是小众的,不一定非要面向大众进行“科普”。非遗是先祖留下的活态遗产,是奢侈的,没有必要在工业文明语境下死乞

文·杨雪

白赖找饭碗。再说内麻一点,非遗传承是可以被奉为信仰供养起来的,其价值就在于活态记录人类文明的细节,不需要被利用。

当然,要供养非遗就涉及制度问题,以一套严谨、科学的选择标准,来确定值得供性留存的非遗,保证其传承过程中的文化属性不变质。就像信众供养僧人,僧人只管清修度世,而不能出去讲经做法挣外快。要不然,谁愿意供养“酒肉和尚”?

仰望者

招生咨询与毕业合影

文·高爽

几个今年毕业的学生希望和我合影留念,但很可惜,我恰好要执行学校的任务,去重庆做招生咨询工作。吾校北师大的每个院系都承担一个省份的招生咨询任务。天文系略小,所以分配给重庆一地,不似北方大省需长途奔波。在重庆,我负责了三场咨询会,接触不下几千名学生和家。学校在重庆的招生人数过百,分数和美誉度都较好,排位前总是少不人的。

在回答高三毕业生和家长问题的同时,手机微信一直在频繁接收到毕业生发来的合影。进进出出的学生,进进出出学校。时光就这样行走在大地,从招生到毕业,从18岁到20岁,30岁,从语数外到恒星震动与宇宙学模型,从向着所心仪的大学奔去,再到急着离开,循环往复,让人感慨。

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大致有两个:我家小孩是女生,老师您看学什么专业合适?北师大学什么专业将来找工作最好?

前一个问题,笔者曾经在科技日报撰文《科学没有性别》讨论过。后一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学校的招生信息上几乎每一个专业介绍里都写着“60%的毕业生攻读研究生”,都写着两三位优秀毕业生的去向,或是拿了国外大学全奖,或就知名大企业。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可能算不得优秀的招生咨询员。我可以介绍毕业去向的比例,宣传校友,解读学科,但我无法回答哪一个专业找工作更容易,我更加不认为,高三毕业生选择大学和专业时,要把重点放在就业前景上。在我报出一些数字后,尽管说服力并不够,但提问者表示接受。他们所追求的并非统计答案,而是一份安心。

似乎,我们的学生所关心的问题,都和他们的父母太相似了。我认识不少研究生,他们本来做着非常优秀的科研工作,毕业后却选择离开学术圈,进入中小学做一名教师。缘由当然有热爱教育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动机是源于稳定。

这两年,我很少听到一位学生表达过他关心世界某个角落里战火中的生灵,或者希望解决目前城市里最严峻的问题,或者计划梳理本学科完整的知识。装在他们的“杰”出的头脑里,就剩下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去年新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天文学史》吸引了非常多学生之外的旁听者。有些不方便赶来教室旁听的朋友,还不忘在网上观看视频。越是走上工作岗位对稳定的人,越是愿意对这门课程表达自己的兴趣。我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大群校外人员旁听,感到既惊喜又悲伤。惊喜的当然是自己的课受到欢迎,悲伤的是,他们本该在追求智慧的时候把向往投向了生活的稳定,现在才回过头来,企图拥抱智慧。

在热闹的招生咨询人群里,我见到渴求智慧的仰望者极少,只看到了力图预定稳定的不安者;在毕业生的合影中,我也看不见发愿改变世界的“傻瓜”,只看到了朝着稳定飞奔过去的恐惧者。“适应社会”“接地气”“稳定”,就随着时光在大地上行走,几十年之前是这般,几十年之后还是这般?

云雾谜话

文·林之光

有关云的谜话,多是从它的形状、流动性、多变等几个方面设谜面的。

例如,从形状方面有:“发怒时千军万马,平静时薄如轻纱。一忽儿崇山峻岭,一忽儿平地江湖”;“静如岩石动如马,厚如棉絮薄如纱。聚散无常多变化,天晴雨霁全由它”。说它颜色的有:“天上飞来白絮棉,有时却被浓墨染”。形容它多变的有:“忽然不见忽然有,像龙又像狗。有时能遮半边天,有时只是一朵朵”;“天上有个魔术师,爱给大家变戏法。变猪变羊又变马,飘来飘去又变啦”!

云是由水气凝结形成的无数小水滴组成的。大气中相对湿度上升到100%时,云就突然出现,反之则突然消失。而空气中相对湿度变化主要决定于温度,温度的变化主要决定于气流是上升(降温增湿)或是下降(升温降湿)。例如夏季中大山般的积雨云就是由于白天地面被太阳晒热,贴地面空气受热上升形成的,积雨云旁边的晴空区多是下降气流的天下。实际大气中气流经常升降不定,所以云朵才会千变万化,而且变化迅速。

所以,“虽然没有脚,却能游九州”作为云的谜面,严格来说是不对的,一是云也是有脚的,即上升气流的起始段,只不过因为水汽尚未凝结,看不见罢了;二是云经常在变化、生消的,此刻的云已不是那时的云,这和“人不能同一次进入同一条河流”的哲理是一样的。

雾的谜面,主要是取形状描写和消失原因两个方面。例如,“像云不上天,像烟不是烟”;“又像轻纱又像烟,飘飘荡荡在眼前。你要抓住它不住,太阳露头就不见”;“满天地间似白烟,不熏不呛性子绵。风儿吹来轻轻飘,太阳一晒便不见”。其实,雾就是没有上天的云,太阳一晒,温度升高,雾中相对湿度降到100%以下,雾自然就消散了。再有,现在在大气污染严重的时候,雾也并不是“不熏不呛性子绵”的。

桂下漫笔

龙渊印社:一个NGO的“节操”

文·胡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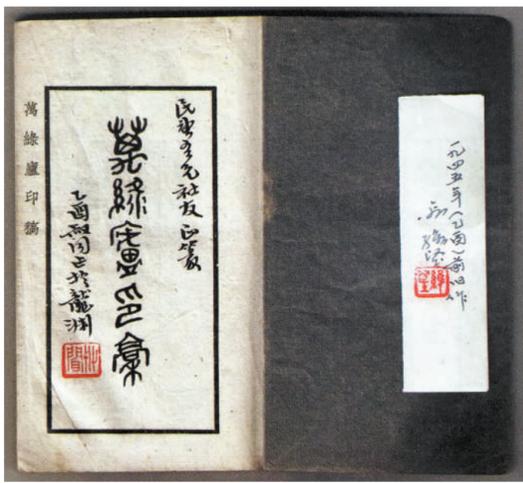
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开篆刻家结社之先河,百余年来,稳坐中国印社头把交椅。那么,如果排一排座次,这第二把交椅归谁呢?篆刻家林乾良认为,应归“龙渊印社”。

今天,知道龙渊印社的人,可能已不太多了。这个文艺社团成立于1945年,当时,浙江的一些机关和文化人避战乱于浙南山区,聚集在古城龙泉一带。龙泉旧名龙渊,唐代避高祖李渊之讳改为龙泉,发源者乃以龙渊为印社之名。后来,抗战胜利,机关回迁,龙渊印社也迁到了杭州孤山的西湖博物馆内。翻看龙渊印社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1948年,由于人事变动,印社工作陷入了停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复社之动议,90年代末正式复社。龙渊印社的社员也不算多,全盛时期也仅百余人而已,和今天某些动辄会员“十万+”的文艺社团比起来,似乎简直不值一提了。即便如此,龙渊印社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龙渊印社的发起人共有十位,其中,后来担任董事长的金维坚为西湖博物馆馆长,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界人士,但专业背景却是植物学,还有数位则是浙浙盐务管理局等处的“公务员”。百余名社员的社会身份更是五花八门,不少看起来是文艺的“圈外人”。

我想,身份多样,无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为利而来,以追求艺术的名义,钻入这个圈中,混一个头衔,博一些好处。这段时间,被屡屡曝光的所谓“山寨社团”中,文艺类不在少数,其会员人数不但多而且杂。其实,在那些并非“山寨”的正牌社团中,也有不少和艺术不沾边的官员混迹其中。另一种则是因趣而聚。艺术本是一种人情趣,是人们为了打发与生俱来的无聊而作的消遣游戏。西谚有云,羽毛相同的鸟儿总会聚在一起。文人结社,自古有之,本就是为自己的心灵找一块落脚的地方,寻几个闲谈的朋友罢了。

龙渊印社无疑属于后者,身份的多样恰好表明了艺术的纯粹。《筹组龙渊



龙渊印社的成立纪念章,由余任天所作,一朱一白“民国卅四年三月四日龙渊印社成立纪念之章”。

印社小启》中有这样一段话,“飘蓬人海,避地剑川。待靖时艰,恢弘国粹。纵横刻画,寄托乡愁。第念学从切琢,求始嚶鸣。欲期广益,端赖集思。用约鸿彦,筹组印社。雅致的文辞,映射出这一群人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社员之中,颇多自学成才,痴迷艺术之士。”

这则“小启”之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社员以“待靖时艰,恢弘国粹”为己任,可见其家国情怀。印社诞生于抗战时期,从在龙泉成立,到迁至杭州,共举行雅集24次,各次印题中,除了“纵横刻画”“问梅消息”“秋菊菊餐”“文章有神交

有道”等充满文艺范儿的语言之外,还有“还我河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必胜”“胜利第一”“永奠世界和平”“指天仇讎天下平”等豪言壮语。用今天的话说,这些语句充满了正能量,属于主旋律,但似乎并没有对社员的艺术创作造成什么妨碍。换做老套一点的话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或者说“刻什么”与“怎么刻”,在对艺术、社会的真实情感映照下是完全相融相洽的。

雅集,是印社最重要的活动,社中制定了专门的《雅集办法》,规定“各社友均须一律参加,无故不得缺席”,社友

轮流担任雅集的主持、策划及接待事宜。参加雅集的社员必须携带自己的作品,并将拓印活页互相交换,如果自认学艺未精,没有作品,则需提交同数之空白活页顶替换取社友印迹。外地不能亲自参与的社员,由印社代办作品交换。这些规定合理、务实,把艺术创作放在了印社各项活动的核心,为印社的规范发展打下了基础。反观今日一些文艺社团的所谓“雅集”,不但缺乏文人应有之“雅”意,且有拉帮结派、营私牟利等不雅之举,令人叹息。

龙渊印社的社务管理,也颇有可引令人深思之处。在龙泉时,社中成员只有35人,迁到杭州之后,人数激增,达到了90多人。以常理揣度,一个社团发展壮大,入会人员自然多多益善,但我们在《龙渊印社月刊》第六期(1947年)上却看到这样一则社讯:“本社社员激增,近已达九十余人,办理一切文件刊物收发手续至繁。惟本社社务均由社友公余义务担任,不设专任,为免致疲弛起见,不得不予以限制,拟满百人后暂停入社,嗣后须俟有出社名额递补之。”

节制,是一个组织必需之精神品格。尤其是民间以趣味相维系的社团,最可怕的并非人丁不旺,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龙渊印社的主要活动是雅集和出版社刊,没有财政拨款,也不干代人刻章的活,更不以组织社员出售作品牟利,维持运转主要靠社员费和月费,还有社员的募捐。在创设之初,入社费为每人300元,月费为每人100元;后来,通货膨胀压力日重,从1947年1月起,入社费改为5000元,月费为1000元。据近代物价史料资料大体换算,1947年的100元大概可以购买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这么算来,1000月费,也就是一顿早餐钱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往,皆为利往”,或许是人间残酷法则,但这条法则却不应用于缪斯女神的殿堂。又或许有人说,身处滚滚红尘,无人可以免俗,那么,不妨读一读龙渊印社的往事吧。

文·邵鹏

1959年4月19日,吉索普对人宣称自己对费城实验这一事件的调查有了突破。第二天,他被发现在自己的车里死去。他去世时汽车的发动机处于在工作状态,一根连接尾气排放管的管子被通到车的后窗。最终吉索普死于缺氧。警方调查之后,认为吉索普死于自杀。但不少对费城实验感兴趣的公众对此说法并不买账。

虽然军方一再否认费城实验的真实性,不少人一直坚信它的存在。费城实验也不断出现在小说及影视作品之中。

二战已经距离我们有60多年。当年雇员多达四万余人的造船厂早已衰落,难觅往日的繁荣。事实上,爱因斯坦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不断发表关于统一场的研究结果,结果却并未达到他的设想,并不成功。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费城实验也不可能是事实。人们对它的盲目相信除了猎奇心理和对阴谋论的热衷,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来自于对诸如宇航器和军舰在雷达系统面前消失的“隐形”技术的误解,以及谣传。而所谓的“目击者”看到实验时包裹着军舰的绿色浓雾,则可能是一种叫“圣·埃尔夫之火”的自然天气现象。

科林碎玉



转机费城。才知道费城国际机场就在达拉克尔河边,紧邻着有近两个世纪历史的费城海军造船厂。飞机即将降落,掠过平静的河面,让我想到老电影《费城实验》。因为传说中那个实验,就发生在这个老造船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却也是迫使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军事上的需要,让参战双方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新技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通讯、医疗、能源技术,不少是当时的发展奠定下来基础。费城实验,也是借着这样的东风,变成了传奇故事。费城海军造船厂在二战中盛极一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战时这里为美军

生产出53艘军舰,修复了近600只各类舰船。而这里的海军实验室还为“曼哈顿计划”提供钚235。

费城实验据传发生在1943年10月间。实验的理论基础非常“坚实”,是爱因斯坦尝试建立的“统一场”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试图用一种场的理论尝试将电磁场和重力场统一起来。不难理解,假如这样的理论成立,就可以让光的传播发生扭曲,进而让物体隐形。对于战争中的海军来说,让自己的军舰完全隐形,是多有诱惑力!实验的主角是美国海军的驱逐舰艾德里奇号。据说实验从1943年夏天开始,艾德里奇号安装了实验所需的产生强大电磁场的设备。随后

费城实验的“往事”

实验取得了一定成功。

据说实验时,整艘军舰被绿色的大雾笼罩几近消失。实验时在船上的人们,在事后出现了严重的恶心等不适症状——这和预想的一样,既然是时光和电磁场、重力场被扭曲,估计人体内的前庭感受器会“不知所措”,无法辨别方向或者保持平衡。不幸的是,实验导致了可怕的意外伤亡。大概是由于空间的扭曲,实验结束时,不少船员被“嵌”在了船体的钢铁之躯中——有的露着脑袋,有的露出四肢,有的干脆就整个被包裹在某个墙壁或者柱子里面,成了血肉之躯铸就的“夹心饼干”。有消息说,此后军方就改变了实验方向,不再要求船体从肉眼内隐身,而是可以在敌军的雷达监测中隐形。意外伤亡的原因,被解释为“校准(calibration)”出现了偏差。

当年10月,军方进行了第二次实验。据传实现了新的突破:不仅艾德里奇号隐身成功,还被一道蓝色的光送去了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弗吉尼亚州,并瞬间返回原来停靠的位置——科学家们让“时空穿梭”成了可能。这一船员们依然出现了严重的生理反应,甚至失去生命,有人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有的人干脆

由内而外的变成了另一种材料,失去了肉体——这也解释得通——强磁场让分子的排列发生了变化,于是物质也变了性。

人们相信,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一定是那些勇于挑战军方“封口令”的当事者透露出来的。不过实际上这如科幻小说一般的情节都和那个叫莫里斯·吉索普的业余研究者兼畅销书作者有关。吉索普的职业是汽车零件销售,但他拥有天文学硕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没有获得学位,是个知识分子。他的研究对象是UFO——不明飞行器。吉索普1955年出版的《UFO案例》一书,为他赢得了知名度。

1955年,吉索普收到了一个叫卡洛斯的阿兰德的人寄来的信。信中,阿兰德自称是费城实验事件的知情者。吉索普很感兴趣,认真用明信片回了信,索要更多证据的细节。但几个月之后收到的回复中,阿兰德的名字成了“卡尔·阿兰”。他说自己无法提供证据。吉索普怀疑他是个骗子,中断了与他的通讯。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就不会有后续那么多衍生出的故事。

据说1957年,吉索普被海军研究办公室请到华盛顿,协助调查一宗离奇事